

经济制裁背景下津巴布韦 政治稳定探源*

曾 珠

内容提要 津巴布韦民盟政权在 2000 年实施“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在多方因素影响下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恶化，遭到来自美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随着经济制裁延续，津巴布韦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影响，民盟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然而，虽然经济制裁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迫使民盟不得不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并分享权力，但是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民盟的执政根基。民盟政权能够在危机中保持政治稳定与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密切相关：从解放战争起至实现独立后塑造的“反帝反殖”意识形态合法性是其政治稳定的保障，并在制裁危机中不断被强化；庇护政治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与“向东看”政策下的国际合作成为其绩效合法性的来源；选举制度保障了其执政的程序合法性。三种权力合法性基础构成民盟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缓解了制裁对政权的冲击。

关键词 津巴布韦 经济制裁 权力合法性 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曾珠，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西安 710049）。

1980 年独立之后，在穆加贝政权领导下，津巴布韦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各领域取得很大成就，一跃成为“非洲的榜样”。经历十年快速发展，在苏东剧变及民主化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津巴布韦展开了系列政治经济变革，建立多党制，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推行经济自由化，但由于改革措施严重脱离实际且过于激进，国家经济陷入泥潭，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复员老兵和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崛起，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经济制裁与反制的网络化分析——以津巴布韦为例”（编号 SK2022009）的阶段性成果。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民盟”）面临巨大的执政危机。为突破内政外交困局，穆加贝政权于 2000 年开启“快车道”土地改革，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施的土地重新安置计划进行激进化改革，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方案。但由于改革触动了白人农场主利益，加之穆加贝政府实施的停止经济结构调整、打击反对派、谋求连任等系列变革措施引发西方国家不满，津巴布韦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恶化。自 2002 年起，美国^①、英国^②、欧盟^③、澳大利亚^④、加拿大^⑤等国相继以“民主”“人权”为名，对津巴布韦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实行个人制裁、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武器禁运、资产冻结和旅行限制等。虽然西方国家强调只是定向制裁，不针对津巴布韦民众，但由于受到次级制裁和其他国家过度追随的影响，西方制裁已具有全面制裁的重要特征，给津巴布韦带来巨大负面冲击。^⑥ 制裁导致津巴布韦国际发展环境恶化，国内通货膨胀加剧，民盟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迫于内外压力，津巴布韦在 2009 年组成联合政府，并于 2013 年制定和通过新宪法，依照宪法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民盟再次开启一党执政局势。2017 年，在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叠加下，穆加贝被迫辞职，姆南加古瓦继任总统，领导民盟继续执政。美国将民盟执政视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威胁，因此继续对津巴布韦实行经济制裁。2024 年 3 月，拜登政府针对津巴布韦制裁方案作出重大调整，终止自 2003 年以来实施的针对津巴布韦局势的紧急状态，但仍保留 2001 年出台的《津巴布韦民主与经济恢复法案》的有效性，并将包括姆南加古瓦总统在内的 11 名个人和 3 家实体纳

-
- ① “Zimbabw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covery Act of 2001,” Public Law 107 – 99 107th Congress, December 21, 2001, https://www.congress.gov/107/plaws/publ99/PLAW_107publ99.pdf, accessed March 5, 2024.
- ② “Explanatory Memorandum to the Zimbabwe (sanctions) (EU exit) Regulations 2019,” UK 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2019 No. 604,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19/604/pdfs/uksiem_20190604_en.pdf, accessed March 5, 2024.
- ③ “Council Common Position of 18 February 2002: Concern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Zimbabw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1 February, 2002,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6-03/council_common_position_145_180202.pdf, accessed March 5, 2024.
- ④ “Zimbabwe Sanctions Regim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https://www.dfat.gov.au/international-relations/security/sanctions/sanctions-regimes/zimbabwe-sanctions-regime>, accessed March 5, 2024.
- ⑤ “Canadian Sanctions Related to Zimbabwe,”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sanctions/zimbabwe.aspx?lang=eng, accessed March 5, 2024.
- ⑥ 沈晓雷：《美国制裁津巴布韦的举措、影响及本质》，《西亚非洲》2023 年第 4 期，第 117 页。

入制裁名单，旨在重新确定制裁目标并使用新的法律政策工具以提升制裁效果。^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了长达 20 多年的经济制裁，企图削弱民盟执政领导力，^② 但是至今民盟依然在国内保持执政党地位及政治稳定。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反制裁与保持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西方制裁压力下，民盟为何能够维系执政党地位和政治稳定，学界对此有多种观点：一是持制裁方视角，从制裁的强度、方式、影响范围等方面探讨制裁有效性。有学者认为，制裁产生的经济压力不一定能传导为政治压力，制裁措施未得到有效实施是重要原因。^③ 二是持目标国视角，讨论目标国的政体形式、国家自主性、社会政治心理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关联等因素对制裁效能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民盟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使其具有凝聚国内认同的意识形态优势，西方制裁反而成为民盟团结民众一致对外的因素。^④ 三是持第三方视角，认为第三方与目标国的经济合作是导致制裁失败的关键原因，例如津巴布韦得到南部非洲国家尤其是地区大国南非的支持，以及积极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有助于其缓解制裁压力。^⑤ 既有研究鲜有从权力合法性角度讨论制裁压力与政治稳定的关联，而事实上在津巴布韦案例中，经济制裁的根本逻辑在于通过制造经济困难和发出舆论信号，试图使执政党在国内及国际社会失去政治认同从而丧失权力合法性。因此，确保权力合法性，保障政权稳定是民盟对内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理解其在极端压力下维持政治稳定的切入点。为更好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以学者赵鼎新提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三种分类为分析视角，^⑥ 探讨民盟政权维系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程序合法性的表现、方式及特征，以期对民盟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应对策略与逻辑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① “Treasury Sanctions Zimbabwe’s President and Key Actors for Corruption and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rch 4, 202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2154>, accessed March 10, 2024.

② Mogashoa Thato Johnny: “US Sanctions on Zimbabwe: Comprehensive Rather Than Targeted Sanctions,” *Journal of African Foreign Affairs*, Vol. 11, No. 1, 2024.

③ Jan Grebe, “And They Are Still Targeting: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Sanctions against Zimbabwe,” *Africa Spectrum*, Vol. 45, No. 1, 2010, pp. 28 – 29.

④ Heather Chingono, “Zimbabwe Sanc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Lingo’ Guiding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anctioners and the Sanctionees,”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2, 2010, p. 68.

⑤ Frangton Chiyemura and Obert Hodzi, “Stoking USA – China Rivalry: Zimbabw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ts Anti – Sanctions Agenda,” in Kari Roberts and Saira Bano (eds.), *The Ascendancy of Regional Powers in Contemporary US – China Relations: Rethinking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pp. 215 – 235.

⑥ 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6 年第 8 期，第 167—178 页。

经济制裁背景下津巴布韦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与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这与二战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随着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确立，西方国家自身民主化实践的成功以及相关政治思想的发展，为把民主化推广至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然而，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带来深层次政治危机，致使政治稳定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遇到的重要难题，也因此成为政治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命题。政治稳定与政权稳定在现象层面具有高度一致性，政权稳定通常是政治稳定的表征，而政权不稳定并非意味着丧失政治稳定性。依据亨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定义，政治稳定具有秩序性和连续性的特点，是否存在一个合法公共性秩序非常关键，相较之下，政权稳定则更加强调执政者的稳定，即不存在执政领导人非正常更迭。^①在津巴布韦案例中，民盟在严厉的制裁压力下维持了政权稳定，执政权在民盟内部交接，同时政治体系内并未出现强有力的政治反对力量，政治体系未发生根本改变，体现了政治稳定性。

（一）经济制裁、政治稳定与权力合法性

依据亨廷顿的观点，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其中，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绩效、政治认同等，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则包括政府权威、政治吸纳能力、政党制度和政治改革策略等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而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即政治制度化水平是否能够与政治参与需求相适应，决定了政治是否稳定。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说，政治稳定的内在力量是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的核心与本质问题是政治合法性问题。^②权力合法性构建如果能够满足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需要，政治认同就能增强，政治稳定性得到巩固。韦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权力合法性进行了分类，即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为分析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提供了可能性。赵鼎新在韦伯的基础上对权力合法性的分类进一步完善，根据其来源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对应的是价值观体系，包括世俗与宗教的意识形态；绩效合法性

① 赵付科：《“政权稳定”概念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7页。

② 杨绘荣、张静：《动态性与实践性：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的逻辑联系——兼论政治认同的功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131—142页。

对应的是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程序合法性强调合法性来源于一套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政治程序。^① 三种合法性是权力合法性的三个最本质面向，并且互相影响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这一分类方法为研究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细致的分析框架。

经济制裁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频繁使用的、被视作介于外交谈判和军事手段之间的、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对外政策工具。从发展演变轨迹来说，经济制裁经历了从全面制裁走向定向制裁，并且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多方参与及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单边主义等特征。经济制裁的逻辑在于，通过施加经济压力迫使目标国改变其政策行为，甚至动摇颠覆目标国政权，其中的关键在于动摇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根基。从这一逻辑出发，经济制裁发挥有效性的传导机制如下：

一是制造绩效合法性困境。制裁国通过经济制裁手段切断目标国政府重要的对外经济联系，增加国内经济压力，造成民众的剥夺感上升，民众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改变现状，从而对执政党治理能力形成更高要求。执政党如果不能处理好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缺乏足够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那么经济压力可传导为更大的政治压力。尤其在达不到相应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及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的情况下，经济恶化会引发社会运动及反对力量崛起，从而动摇政治体系，影响目标政权的执政地位。

二是破坏意识形态合法性。制裁国通过经济制裁发送威慑信号以及舆论信号，破坏目标政权的政治认同。一方面通过制裁对目标政权及第三方国家发出威慑信号，达到以最小成本迫使目标政权改变政治行为及维护霸权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将“民主”“自由”等制裁借口写入对外政策文件，并尽可能发起制裁联盟形成多边制裁压力的方式，争取目标国民众和反对力量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动摇目标政权的政治认同基础。

三是在绩效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缺失的情况下，民众可以通过选举机制推翻目标政权，从而实现目标国政权更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给霸权国家提供了破坏某一特定国家经济网络的物理基础。对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经济结构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制裁破坏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环境，加大了政府经济治理的难度，使得政府难以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及合理的资源分配，由此面临绩效合法性挑战。同时，制裁方通常将目标政权作为“民主化”的反面并实施域外长臂管辖，制造国际社会舆论，合理化制裁动机，破坏目标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最后，在民主化框架下质疑目标政权获取权力的程序合法性，并赋予目标国可能发生的社会运动以“道义”

^① 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第169页。

之名，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效应推动政权更迭。

（二）经济制裁与民盟的权力合法性挑战

2000 年“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津巴布韦遭到来自美、英、欧盟、加拿大等多方经济制裁。从表面上看，穆加贝政府针对白人农场主的激进改革措施侵犯了私有产权，严重侵犯人权，是引发制裁的诱因。^①但从深层原因来说，殖民遗产下的经济结构和种族主义问题在津巴布韦国家建构中导致日益尖锐的矛盾，迫使穆加贝政府进行改革而引发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问题，意味着对西方构建的“自由民主”秩序形成挑战，加之穆加贝政府此后对内外开展日益激进的改革，触动西方利益而引起西方警惕。2001 年 8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恢复法案》，并于 2002 年起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2003 年美国发布 EO 第 13288 号行政命令启动定向制裁。^②制裁措施除针对穆加贝总统等政治精英和企业实体的旅行限制、资产冻结外，还包括多边金融制裁手段，限制津巴布韦从国际社会融资。2002 年欧盟以践踏人权和选举舞弊为由开启对津巴布韦制裁，^③后于 2014 年取消，但仍维持武器禁运措施。加拿大于 2008 年通过《特别经济措施法（津巴布韦）条例》[*Special Economic Measures Act (Zimbabwe) Regulations*]，对津巴布韦相关个人及实体展开制裁。2002 年津巴布韦被中止英联邦成员国资格，2003 年津巴布韦直接宣布退出英联邦。虽然姆南加古瓦总统表示有重返英联邦的意愿，但是英国脱欧后在制裁问题上并没有让步，而是继续扩大对津巴布韦制裁，包括经济贸易制裁、停止部分技术援助、移民制裁、武器禁运等。^④另外还有其他国家如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均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持续的多方制裁对津巴布韦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强烈冲击。

① 关于西方为何对津实施经济制裁，学界有多种论述，分为制裁方视角与被制裁方视角，后者总体认为“快车道”土地改革是引发制裁的一个重要事件，代表性观点参见 Heather Chingono, “Zimbabwe Sanc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Lingo’ Guiding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anctioners and the Sanctionees,” p. 67; Tapfuiwa James Katsinde, “Effects of Sanctions on Zimbabwe (2000 –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Science*, Vol. 6, No. 7, 2022, pp. 253 – 259.

② “E. O. 13288 Zimbabw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March 10, 2003, <https://ofac.treasury.gov/recent-actions/20030310>, accessed March 15, 2024.

③ “Common Position 2002/145/CFSP,” <https://www.europeansanctions.com/region/zimbabwe/>, accessed March 15, 2024.

④ “Zimbabwe Sanctions: Guidance,” Government of 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zimbabwe-sanctions-guidance/zimbabwe-sanctions-guidance>, accessed March 15, 2024.

1. 经济发展受阻，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2001年美国出台的《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恢复法案》所列出的制裁工具中，金融制裁是对津巴布韦经济影响最大且最为严厉的手段。美国通过冻结资产、切断津巴布韦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把津巴布韦排除在世界金融体系外，致使其经济发展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民生困境。

首先，制裁打击了津巴布韦宏观经济。津巴布韦无法向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等融资或贷款，外部资金来源被截断，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债务居高不下，对外支付拖欠从1999年的1.09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54亿美元，超过公共担保外债的70%。长期资本流入下降，国内企业预算赤字增加，就业机会减少，通胀高涨，大量熟练劳动力流失，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公共产品供给受到巨大影响。同时，由于无法使用国际支付系统，国内民众难以获得侨民汇款，企业发展受限。而缺乏直接投资和市场，导致农业、矿业等关键部门无法发展基础设施，工业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①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起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非法制裁给津巴布韦带来至少4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使津巴布韦经济萎缩了40%。^②

其次，制裁阻碍了津巴布韦支柱产业的良性发展。由于美国对津巴布韦农业、制造业、大型矿业公司、商业银行、对外贸易公司等关键产业部门和相关机构实施制裁，津巴布韦产业发展难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脆弱性。农业发展受到资金短缺、农业物资缺乏的影响，生产大幅下滑，从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变为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维持民众基本生计的国家。^③制造业长期处于负增长或低速增长状态，工业化指数在非洲国家中排名从2010年的第26位下滑至2021年第32位。^④采矿业面临海外市场收缩、融资困难、被迫以低价向国际市场出口矿产品等困境。

再次，制裁对津巴布韦社会民生造成严重影响。由于难以获取融资支持，民生水平大幅度下降。虽然西方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但援助并不能直接促进长期经济发展，援助数量和领域也很有限。此外，在制裁影响下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往往迁移至他国，与津巴布韦民生相关的粮食、清洁水资源、教育、医疗卫生

① “Impact of Sanctions on Zim, Region,” *The Herald*, 11 October, 2019, <https://www.herald.co.zw/impact-of-sanctions-on-zim-region/>, accessed March 17, 2024.

② ZANU-PF, *Taking Back the Economy: Indigenise, Empower, Development&Create Employment*, 2013, pp. 49-51.

③ 李新峰：《津巴布韦：“面包篮子”逐渐变空》，《人民论坛》2018年第6期，第111页。

④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 Industrialization Index 2022,” p. 30, [africa_industrialisation_index_2022_en-web.pdf](https://www.afdb.org/index_2022_en-web.pdf) (afdb.org), accessed March 20, 2024.

等领域受到巨大冲击。^① 2021 年 10 月，联合国专员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记者会上表示，20 多年来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的单方面制裁对该国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侵犯了津巴布韦人民的人权，包括生命权、食物权、健康权、发展权、受教育权以及经济和文化权利。此外，相关制裁措施使津巴布韦政府无法获得足够资金用于维护基础设施、投入社会福利事业，从而对该国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加剧了津巴布韦本已存在的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②

2. 国际舆论环境恶化，国内政治认同受到考验

除胁迫、约束等功能外，经济制裁还具有信号功能，^③ 即制裁方通过制裁措施向国内外传递一个或多个信号，以达到改变受制裁方行为的目的。这些信号包括宣告不满、向联盟国家明确政策意图、向国内选民传递维护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信息，同时制裁行为还可能激化受制裁国国内政治不满和异议，^④ 壮大政治反对派力量等。^⑤

美西方国家通过将经济制裁合法化、合理化对津巴布韦施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意识形态的“污名化”，使经济制裁充分发挥其信号功能。2005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把津巴布韦与古巴、缅甸、朝鲜、伊朗、白俄罗斯共同列为“暴政前哨”六国。有学者评论指出，这一举措将恐怖与“暴政”挂钩，试图通过打击“暴政”、推进“自由”等美国传统价值观，为美国占领意识形态高地作准备，凸显其制裁、打击他国的正义性。^⑥ 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等纷纷将制裁的动机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捆绑起来，为制裁津巴布韦动机的合理化制造广泛的国际社会舆论。

美西方制裁也成为津巴布韦国内政治反对派借以反对执政党民盟的明确政治信号。反对派民革运崛起，成为改变津巴布韦政治格局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民革运自 1999 年成立后，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变革”等旗号，抨击民

① Gideon Gono,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against Zimbabwe," http://rbz.co.zw/pdfs/farm_mech/sanctions.pdf, accessed March 20, 2024.

② "Zimbabwe: Expert Calls for Lifting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Urges Talks," United Nations, 28 October, 2021,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1/10/zimbabwe-expert-calls-lifting-unilateral-sanctions-urges-talks>, accessed March 23, 2024.

③ Makio Miyagawa, *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New York: McMillan Press, 1992.

④ Thomas G. Weiss, "Sanctions as a Foreign Policy Tool: Weighing Humanitarian Impuls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5, 1999, pp. 499 - 509.

⑤ Jean - Marc F. Blanchard and Norrin M. Ripsma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When 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Best?"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 - 2, 1999, pp. 219 - 253.

⑥ 李晓岗：《赖斯出台“暴政前哨”》，《世界知识》2005 年第 4 期，第 44 - 45 页。

盟政权，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民盟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与其展开意识形态的认同竞争。2008年津巴布韦举行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联合选举，在两轮选举后穆加贝才宣布获胜，但是反对党民革运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两派支持者爆发冲突，引发国内政治危机，民盟政治认同受到极大考验。美西方试图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草案，进一步加深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津巴布韦政治危机持续加剧。

3. 民盟执政受到挑战，与反对党分享政治权力

随着制裁压力增加，国内反对派势力不断壮大，民盟同时面临国际舆论的讨伐与围攻，不得不与反对派展开对话谈判并分享权力。2008年7月，民盟与民革运签署谅解备忘录，2008年9月达成权力分享协议，2009年2月双方组成联合政府，开始了联合执政的任期。但是到2013年，津巴布韦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举行新一届大选，最终民盟赢得选举，重回一党执政的局面。新宪法对总统任期做出明确限制，规定总统任期为5年，连任不超过两届，同时对继任、罢免总统及总统豁免权做出规定。此外，宪法强化了议会权力，设立了宪法法院，要求警方与军方在选举中必须保持中立，并加强对妇女政治、社会权利的保障。这些措施可被视为民盟政权在内外压力下权力合法性受到直接挑战后各方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制裁压力下民盟政权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

在制裁压力下，外部经济政治环境恶化，津巴布韦原本存在的政治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反对势力崛起，经济民生水平大幅滑坡，人民对改善民生的要求增强。在几次总统选举中，反对派不接受选举结果，选举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对民盟政权稳定造成破坏。然而，从长时段来看民盟政权仍然保持了政治稳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统治集团内部稳定。津巴布韦通过武装斗争获得国家解放独立，民盟是领导军队赢得抗争胜利的关键力量。从穆加贝到姆南加古瓦，对军队的掌控以及得到老兵力量的支持构成民盟掌握核心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与手段。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民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联合起来组成“爱国阵线”，并促成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召开，最终实现民族独立。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政权实行民族团结政策，推动民盟与人盟两党合并，缓解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之间的矛盾，并完成军队整编，确保国家稳定。在遭受制裁环境下，民盟被迫与反对派分享权力并组建联合政府。2017年11月，穆加贝辞职

后，姆南加古瓦领导民盟继续执政，掌握党政军大权，并在意识形态上与穆加贝时期保持一致。

二是反对势力无法对民盟政权构成威胁。从社会环境来看，跟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津巴布韦现代化进程缓慢，经济社会结构呈二元状态，城乡差异明显，民盟争取的政治力量主要为农民、老兵等社会阶层。土地改革强化了农民、老兵等重要社会力量对民盟政权的支持。同时，经济制裁截断了外部资金来源，阻碍了企业发展，现代化对社会领域的冲击有限。此外，民族主义叙事贯穿于国家独立到建构过程中，政治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反对党必须站在民盟的对立价值立场争取权力，自由主义立场成为反对党的必然选择。^①然而在两党联合执政期间，反对党并没有体现出务实的执政倾向和更佳的执政绩效，加之自由民主价值观未能胜出民族主义价值观，成为其在选举中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民盟得到非西方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虽然制裁使得津巴布韦被美西方孤立，但是积极的对外政策让其能够在国际环境中寻求战略平衡与支持。有学者认为，民盟采取“向东看”战略，积极与亚洲国家友好往来，有利于抵消制裁的不利影响，同时在制裁的话语权上，民盟强调单边制裁干涉了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这为津巴布韦争取到广大南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②在制裁立场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非洲区域组织明确表示，美西方对津巴布韦的制裁是非法的单边制裁。中国在多个外交场合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外部干涉、走自主发展道路，郑重呼吁美西方国家尽早解除对津巴布韦的非法制裁。在 2021 年 11 月中国政府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积极推动解除针对非洲国家不合理的单边制裁是一项重要内容。与此同时，非盟、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组织也对津巴布韦表示支持。例如，2010 年南非总统祖马在欧盟—南非峰会期间呼吁西方国家解除对津制裁，这是因为“制裁不仅破坏了哈拉雷通往政治和解的道路，也伤害了南非”^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轮值主席宣布 10 月 25 日为反对津巴布韦制裁

① Sabelo J. Ndlovu – Gatsheni and Pedzisai Ruhanya, *The History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Zimbabwe: From Mugabe to Mnangagwa*,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87 – 90.

② Frangton Chiyemura and Hodzi Obert, “Stoking USA – China Rivalry: Zimbabw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ts Anti – Sanctions Agenda,” in Kari Roberts and Saira Bano (eds.), *The Ascendancy of Regional Powers in Contemporary US – China Relations: Rethinking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p. 225.

③ “South Africa’s Zuma Calls for End to Zimbabwe Sanc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 September 29, 201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opics/en/article/20100927STO83657/south - africa - s - zuma - calls - for - end - to - zimbabwe - sanctions>, accessed March 25, 2024.

的团结日。^① 非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强调非盟的立场为：“长期以来要求立即无条件解除对津巴布韦共和国机构和个人的制裁。”^②

民盟能够维系政权稳定，说明其权力合法性仍然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制裁压力是权力合法性来源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变量，民盟在制裁压力下更是需要巩固其权力合法性。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构成而言，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民众政治认知模式。绩效合法性指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当绩效合法性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时，工具理性在民众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占据上风。意识形态合法性指对某种价值观和信仰的尊崇，是对韦伯的传统合法性及魅力合法性概念的合并。当意识形态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时，价值理性占据上风。程序合法性是对韦伯法理合法性的补充，指法律和行政原则之外的一些被广泛认可的政治程序，比如民主选举和各种在政治过程中被广为遵循的潜规则等。^③ 当程序理性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时，形式理性占据上风。三种合法性来源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在经济制裁压力下，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及调动资源的能力下降，绩效合法性无法作为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而在社会资源分配上有倾向性。与此同时，国家转向寻求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创造主流价值观，以团聚民众并达成共识，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能够弥补绩效合法性不足的缺陷。此外，业已形成的民主选举程序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形式上的正当性保证了执政者统治的合法性，满足了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降低了绩效压力。基于上述，民盟维系权力合法性的维度如下。

（一）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塑造政治认同

民盟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历史合法性，在独立之后穆加贝不断强化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叙事，加强民族团结与政治认同。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话语一直贯穿于国家建构过程，并在遭受制裁背景下不断强化，突出西

① Moses Michael – Phiri and John Cassim, “SADC Calls for Lifting of all Sanctions on Zimbabwe: 16 – member Regional Bloc Says Move would Facilitate Socio – economic Recovery,” Anadolu Ajansi,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aa.com.tr/en/africa/sadc-calls-for-lifting-of-all-sanctions-on-zimbabwe/2402797>, accessed March 27, 2024.

②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Chairperson’s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Lifting of all Sanctions against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 The African Union, October 25, 2023,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231025/auc-chairpersons-call-lift-all-sanctions-zimbabwe>, accessed March 27, 2024.

③ 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第 169 页。

方与津巴布韦对立的价值观，进而将反对派塑造为民族主义阵营的敌人，争夺意识形态阵地。

首先，革命斗争历史为执政党提供了历史合法性。通过革命历史，穆加贝在党政军内部塑造了极高的个人权威，对军队的领导权赋予他实质性权力和政权支持。穆加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老兵资质，不仅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为其赢得广泛民意，独立之后革命历史叙事更加赋予穆加贝政权以政治权威，并不断塑造强化政权的合法性。穆加贝与解放斗争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认同的纽带与符号。^① 例如，津巴布韦独立后城市中的街道、机构、城镇中心系统地、大规模地重新命名，以穆加贝和解放战争英雄的名字代替殖民者的命名，将政治意识形态融入社会建构。^② 同时，革命斗争也成为民盟推进民族融合的工具。2017 年姆南加古瓦执政后，其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背景使得执政合法性得到继承。

其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民盟构建政治认同的基础。在与南罗德西亚白人政权斗争过程中，津巴布韦的民族认同整体觉醒，“黑人解放”“种族平等”等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津巴布韦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旗帜。独立初期，民盟政权实行以公平增长为目标的过渡性国家发展规划，带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避免莫桑比克的悲剧重现，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划在保留白人特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并提供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国家发展迈上良性轨道。独立后十年，津巴布韦种族矛盾凸显，在英国未能兑现承诺提供土地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民盟加速了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开启“快车道”土地改革，赢得广大农民和复员老兵的支持。在西方制裁背景下，穆加贝将制裁描述为帝国主义行径，强调土地问题是殖民者遗留下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以及突出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经济剥削，通过民族主义叙事话语，穆加贝将自身塑造为第三世界争取解放的领导者之一，并将国内危机的矛盾焦点转移至国际体系层次。^③ 同时，在对待反对党的态度上，穆加贝多次指责民革运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将反对党塑造为破坏国家主权的卖国者。例如在 2002 年选举前后，穆加贝政府声称民革运得到

① Sabelo J. Ndlovu - Gatsheni, "Robert Mugabe's Liberation War Credentials: ZANU - PF's Winning Card?" Research paper for the Heinrich Boll foundation, February 3, 2014, <https://za.boell.org/en/2014/02/03/robert-mugabes-liberation-war-credentials-zanu-pfs-winning-card-publications>, accessed March 30, 2024.

② Zvinashe Mamvura, "'Let Us Make Zimbabwe in My Own Name': Place Naming and Mugabeism in Zimbabw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Vol 40, No. 1, 2020, pp. 32 - 39.

③ Parick Bond and Masimba Manyanya, *Zimbabwe's Plunge: Exhausted National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Social Justic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3, p. 186.

英国政府的支持，旨在阻挠土地改革，建立一个傀儡政府以维护白人利益。^① 民盟政权还非常注重发动群众力量塑造公共舆论与共识，调动民众反对制裁的民族主义情感。2011年，民盟发起第一次全国性反制裁请愿运动，超过200多万人签名，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6。2019年，民盟发起第二次反制裁请愿，姆南加古瓦总统主持此次请愿活动。虽然上述请愿活动未产生实际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津巴布韦民众对于外部“敌人”存在及威胁的感知，起到调动民众“团结在旗帜下”（rallying around the flag）的民族主义效应。

再次，民盟积极开展民族主义外交争取国际支持。独立之初，穆加贝阐述了津巴布韦对外政策原则，强调“国家主权平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社会”“所有民族拥有自决和独立权”“非种族主义”“不结盟和国家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② 这几项原则被视作集民族主义、泛非主义、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多边主义、不干涉主义等特征为一体的复合型政策立场。^③ 本着这一外交立场，民盟十分注重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并在周边外交中维护自身利益和泛非主义原则。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派国防军保护莫桑比克贝拉走廊免受南非白人政权袭击，坚定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在英国拒绝承担土地历史责任以及西方开启针对津巴布韦的定向制裁后，民盟一方面对外强调要坚定捍卫主权，把不屈服的斗争比作“第三次解放战争”，是民族独立斗争的延续；另一方面秉持反帝反殖主义、泛非主义原则与第三世界国家拓展经济政治往来，并得到许多国家和区域组织在反制裁立场上的支持。2008年美英试图强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津巴布韦制裁的决议草案，遭到中国、俄罗斯否决，致使美国未能通过联合国使其单方面制裁合法化。同样，津巴布韦也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场合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美西方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为，例如津巴布韦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反对美西方的霸权主义行径。

（二）通过庇护政治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及扩展国际合作获取绩效合法性

除意识形态合法性，制裁环境下如何利用有限资源改善经济环境和民生则更

^① Mark Daniel Jaeger, “Constructing Sanctions: Rallying around the Target in Zimbabw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 3, 2016, p. 963.

^② H. H. Patel, “No Master, No Mortgage, No Sale,” in Timothy Shaw and Yash Tandon (eds.),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frican and Canadian Perspectiv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p. 229 – 230.

^③ Stephan Chan and Hasu Patel, “Zimbabwe’s Foreign Policy: A Conversation,” *The Round Table*, Vol. 95, No. 384, 2006, pp. 175 – 190.

为关键，这涉及民盟长久执政的政治根基。

其一，土地分配是民盟巩固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实现独立后，民盟一直致力于开展土地重新安置计划以解决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问题。独立初期，穆加贝政府将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村列为发展优先地区，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改善农民生活。^① 但多方因素影响下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仅有 11% 的白人农场主土地被分配，黑人民众对土地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20 世纪 90 年代初，土地问题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黑人农民、复员老兵对白人特权日益不满，对土地诉求日益强烈，加之民革运与白人农场主及英国形成统一战线开展修宪斗争，津巴布韦政治格局出现重大转变，民盟政权面临生存考验。^② 通过赋予黑人农民以及复员老兵以土地，实现以土地资源换取政治忠诚，既能够使民盟获得政治合法性，也是其绩效合法性的体现。至 2009 年，津巴布韦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有 6214 个农场总面积为 1081.6 万公顷的土地被政府征收。^③ 有学者评论，“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白人的大型农场被黑人小农场替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④ 通过这些举措，土地资源分配的受益者成为拥护穆加贝政权的重要力量。

其二，向支持者和关键产业部门倾斜资源以巩固权力。民盟利用执政党地位，将资源分配作为政治工具倾向民盟政权的支持者。研究表明，虽然土地分配纠正了长期以来殖民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但是也具有明显倾向性，即倾向那些与执政党有密切关联的政治精英和军队成员，而一旦这些成员被逐出阵营将失去农场和财产。^⑤ 除土地分配外，矿产、粮食、农业基础设施等资源分配也存在同样的庇护政治现象。例如，矿产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3.2% 上升至 2012 年的 13%，^⑥ 成为津巴布韦的主导产业，民盟给大型矿业公司优惠条件，允许其直接获得外汇并有权在国外开展金融交易，取缔非法采矿等，这使得矿业部门成为支持民盟的重要社会基础。^⑦

① 吴传华：《津巴布韦独立与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46 页。

② 沈晓雷：《“快车道”土地改革与津巴布韦政治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69—75 页。

③ 沈晓雷：《“快车道”土地改革与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第 79 页。

④ Brian Raftopoulos, “The 2013 Elections in Zimbabwe: The End of an Er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9, No. 4, 2013, p. 980.

⑤ Douglas Mpondi,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ne Man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nd Patronage in Zimbabw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Vol. 3, No. 8, 2015, p. 514.

⑥ Showers Mawow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Mining and Accumulation in Zimbabwe: Evidence from the Chegutu Mhondoro Are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KwaZulu – Natal, 2013, p. 76.

⑦ Brian Raftopoulos, “The 2013 Elections in Zimbabwe: The End of an Era,” p. 980.

其三，对外实施“向东看”政策，积极发展外部合作拓展市场和贸易。在长期受到制裁环境下，津巴布韦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穆加贝提出“向东看”政策，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合作，有利于津巴布韦拓宽国际市场，扩大贸易合作渠道，尤其是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为其减小制裁压力起到了积极效应。中津合作自2003年以来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津贸易额从2003年的1.97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3.1亿美元。^①中国向津巴布韦出口产品主要为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合作领域涉及经贸、旅游、农业、基建、矿产等。2019年，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存量近19.34亿美元，涉及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中国还通过提供援助、赠款、出口信贷和优惠贷款以及经济技术支持，促进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这为津巴布韦应对美国制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民主选举程序保障执政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政治民主化浪潮在非洲大陆逐步推进，一些非洲国家政治体制也开始向民主化转型，受西式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影响，建立竞争性多党选举制度和实现程序性民主成为非洲国家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美国出台的《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恢复法案》明确将选举符合民主化标准作为实施制裁的政治目标之一。在此意义上，民盟执政合法性与民主选举程序密切相关，即执政党是否由民主选举产生决定其执政地位是否合法。从津巴布韦选举历史来看，程序性民主选举结果保障了民盟的执政党地位，这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总体来看，津巴布韦政治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2年，民盟谋求建立一党制时期；第二阶段为1992—2000年，民盟主导下的多党民主化时期；第三阶段为2000年以后，民盟与民革运两党并立时期。^②

第一阶段，民盟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不断强化政治主导地位，最终确立了一党制统治。独立之初，根据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达成的共识，津巴布韦实施议会共和制。1980年2月，津巴布韦举行独立大选，民盟获得62.9%的选票和57个议席，以压倒性胜利战胜人盟成为执政党。选举结束后，为推动民族和解和政治稳定，穆加贝政府最初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将人盟成员纳入内阁。然而，随着两党矛盾加剧，穆加贝政府逐步放弃了这一政策，试图通过对人盟施加军事压力使其并入民盟。1987年，经过多轮谈判，民盟与人盟达成合并协议，并明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津巴布韦》，中国商务部，2019年，第26页。

^② 沈晓雷：《中国与津巴布韦友好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确以建立一党制政府为目标。两党合并后，民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最终建立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统治。

第二阶段，尽管面临反对派的挑战，民盟执政合法性在多党制和民主化浪潮中依然得到巩固。20 世纪 90 年代末，受多党民主化浪潮影响，民盟宣布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这一时期共有 14 个反对党活跃在津巴布韦政治舞台上。然而，这一转变并未动摇民盟的执政地位，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中，民盟仍以 92.76% 的高票率胜出，凸显其在选举中的主导地位。虽然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 31.8%，体现出公众政治参与热情并不高，但形式上选举机制仍然保障了民盟的执政党地位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反对党难以与民盟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第三阶段，民盟的执政合法性在多次选举中反复受到挑战，但民盟仍然通过选举机制和政治调整维持了执政党地位。2000 年，穆加贝主持的宪法草案公投遭到民革运反对而失败，标志着民盟与反对派之间政治斗争加剧，津巴布韦政治格局进入两党并立时代。在 2002 年和 2008 年总统选举中，民革运与民盟的选票差距较小。尤其是 2008 年大选，穆加贝首轮仅获 43.2% 的选票，被迫进行第二轮选举，民革运领导人茨万吉拉伊以受到暴力威胁为由退出选举，最终穆加贝胜出。然而，选举后津巴布韦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多重压力下民盟不得不与民革运分享权力，组建联合政府。2013—2017 年，民盟面临的挑战更多为内部权力之争，随着穆加贝年事渐高，接班人问题成为民盟内部纷争的焦点，最终导致穆加贝辞职。在 2018 年大选中，姆南加古瓦以 50.8% 的得票率当选总统，继续保持民盟的执政地位。通过调整执政策略，姆南加古瓦成功稳定政局，进一步巩固了民盟的执政合法性和主导地位。尽管民盟被指控通过操控选举委员会、控制选民名单、复杂化城市选民投票机制并加大有利于自身的舆论宣传等方式影响选举结果，但从形式上看民盟执政合法性仍然通过选举机制得以确立。

津巴布韦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

1980 年至今，民盟执政长达 40 多年，成为非洲国家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即便面临严厉的制裁，民盟仍然通过各种策略维系了政权稳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基础。然而，随着经济制裁长期持续，民盟的经济治理空间被压缩，意味着如果绩效合法性不能兼顾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那么意识形态合法性在长时段将经受考验，继而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迭是有可能发生的。民盟面临的考

验包括民族主义政治的矛盾性、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等方面。

（一）民族主义二元性问题

民族主义二元性体现在它既是通过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创建形成，也需要民众自下而上接受与认同。民族主义是津巴布韦实现独立和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工具。在革命中，民族主义的作用在于将“帝国”与“被压迫者”、“白人”与“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二元对立起来，国家、民族的概念，黑人性等身份政治在西方这一“他者”的镜像中产生，形成自上而下的津巴布韦国家—民族政治认同，广泛调动革命力量。然而在国家建构中，民族主义又遭遇二元性困境。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造成国家分裂的重要因素，民盟虽然在独立之初采取了积极的民族和解政策，促进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和解，但是主要代表绍纳族利益的民盟无法从根本上兼顾主要代表恩德贝莱族利益的人盟，恩德贝莱人的政治不满与日俱增。在穆加贝政权实施民族高压政策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古库拉洪迪事件”之后，津巴布韦党派—民族纷争与矛盾并没有消失，社会整合并没有彻底完成。虽然姆南加古瓦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民族和解措施，但解决民族矛盾十分考验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短期内难以见效。此外，在经济制裁导致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民盟以社会资源分配换取政治支持的做法可能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威胁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

（二）经济治理困境

津巴布韦经济在结构调整期间已经开始显露危机，土地改革及本地化政策体现了给黑人经济赋权的特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置，改变了殖民主义遗留的经济结构，但在制裁压力下，经济关系上的庇护主义现象更为突出。通过有限资源笼络政治支持短期来看使得民盟能够稳定政治局面，原因在于制裁压力下城市化进程不足，工会力量萎缩和城市人口数量较少，非正规就业增多，城市力量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通过社会运动推动政权更迭，农村依然是民盟的重要阵地。然而，长期来看，制裁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加上内部经济结构脆弱化与经济治理水平不足，将使民盟执政能力受到严峻考验。

自2000年以来，津巴布韦经济一直处于下滑态势，这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现广泛的经济增长情况形成对比。从表现来看，津巴布韦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化水平较低，导致其严重依赖矿产资源，如钻石和黄金等初级商品出口，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从1992年的26.9%下降到2014年的11.7%，而非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中占比较高，大量

人口依赖非正规经济谋生，贫困率上升成为普遍现象。^① 由于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过于激进，津巴布韦经济还面临储蓄负增长和投资低迷问题。此外，财政和债务管理不善、腐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退化等问题均比较突出。民盟的经济治理效能既受到殖民历史遗产的制约，也与其治理方式、自身管理及制裁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殖民统治遗留的种族不平等经济结构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为民盟开展有效的经济治理制造了二元困境。独立初期，民盟推行“增长与公平”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为实现经济增长，民盟不得不保留白人经济活动，难以有效缩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这引发黑人的强烈不满。为解决突出的种族矛盾，民盟开展土地重新安置计划，但其进程缓慢最终未能有效解决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其次，民盟激进的经济治理方式打击了本土经济。无论是“快车道”土地改革，还是本土化政策，均因实施方式过于激进而产生负面影响。“快车道”土地改革大量征收白人农场主土地，而获得土地的黑人又缺乏足够的技术与经验，再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和农业投入不足，津巴布韦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而本土化政策要求外资股权过度让渡，严重影响了津巴布韦吸引外资的能力，导致制造业和采矿业低迷。民盟庇护政治下的资源换忠诚等腐败问题也成为制约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

再者，美西方制裁严重恶化了津巴布韦发展所需的金融经贸环境。美国冻结民盟政权“破坏民主机制”“侵犯人权”“参与腐败”的相关机构、个人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及财产性权利，禁止向制裁对象提供实质性的协助、赞助或财务、物资、后勤、技术支持，对违反制裁规定者处以高额罚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行使投票权和否决权，否决津巴布韦提出的任何有关信贷、融资、减免债务等申请，使得津巴布韦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对其商业金融部门造成严重打击。津巴布韦商业银行在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代理银行，而其他国际银行因担心制裁而不得不谨慎处理与津巴布韦的金融往来。同时，金融制裁对津巴布韦的国际合作也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对在津巴布韦的中资企业来说，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可能面临受到美国金融系统监控并扣留资金的风险，中资企业可能时常面临津巴布韦企业无法通过金融系统履约、偿还贷款等问题。目前民盟政府正积极出台政策减少金融制裁对其经济合作的干扰，比如

^① Godfrey Kanyenze, Prosper Chitambara and Judith Tyson, “The Outlook for the Zimbabwean Economy,” 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017, https://set.odl.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SET-Outlook-for-Zimbabwe-Economy_Sep2017.pdf, accessed April 2, 2024.

使用多种货币结算，改革创新贸易、支付、清算系统，加强对加密货币、区块链、金融科技之类的创新研究等。

（三）政治民主化挑战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制裁下的津巴布韦政治民主化发生了严重倒退，选举暴力、人权侵犯、公民政治参与空间被压缩等行为屡见不鲜，体现了国家专制主义。^①但是，在笔者看来，西方制裁依然推动了津巴布韦政治民主化进程，政治民主价值的诉求在未来将成为民盟政权稳定的挑战。

制裁对津巴布韦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推动了2009年两党联合政府形成和权力分享。在制裁压力下，津巴布韦经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反对势力迅速崛起，反对党民革运的力量在西方支持下不断壮大，以“民主”“自由”“人权”“变革”等旗号抨击穆加贝政府，并在选举中获得许多议席，与民盟分庭抗礼。迫于反对派势力及国际社会压力，民盟不得不与民革运组成联合政府。在此后的历次选举中，民革运成为影响津巴布韦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次，在制裁背景下，民盟巩固政治权力的方式依然是在宪法框架下进行。为了谋求执政合法性，民盟与反对党的斗争通过修改宪法或是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而非采取超出宪法的手段，也没有改变多党制和竞争选举等程序安排。例如，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民盟于2000年开启宪法修正草案，强调对白人征收的土地不再予以赔偿，之后民盟还通过一系列土地征用修正法案，如《农村土地占用者（保护不受驱逐）法》[*the Rural Land Occupiers (Protection from Eviction) Act*]，使农场占用合法化，该法案被裁定为符合宪法规定。^②2013年，津巴布韦制定新宪法并通过全民公投，宪法对总统任期、总统豁免权、议会权力都做出特别规定。反

① Musiwaro Ndakaripa, "Zimbabwe's Economic Meltdown: Are Sanctions Really to Blam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21, pp. 95 - 120; Jan Grebe, "And They are still Targeting: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Sanctions against Zimbabwe," *Africa Spectrum*, Vol. 45, No. 1, 2010, pp. 3 - 29; Heather Chingono, "Economic Sanctions: A Panacea to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in Zimbabwe?"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1, 2010, pp. 192 - 216; Mark Daniel Jaeger, "Constructing Sanctions: Rallying around the Target in Zimbabw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 3, 2016, pp. 952 - 969; [津巴布韦] 荷娜: 《强制外交和极权主义体制——评估经济制裁对津巴布韦民主的影响 (1980—2010)》,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 第75页。

② Lovemore Madhuku, "Law, Politics and the Land Reform Process in Zimbabwe," in Medicine Masiwa (ed.), *Post - Independence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Controversies and Impact on the Economy*,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Harare, 2004, pp. 124 - 146.

对派与西方国家质疑津巴布韦宪法及法律法理正当性，因为从广义的法治来看，国家必须依法行事，法律也必须符合公正、公平、被普遍接受的原则，但是从狭义的法治来看，政府如果按照规定法律行事，那么就是法治，无论其内容如何。^①这也成为民盟始终将法律作为维护权力及国家治理的关键工具，以及反对西方制裁的重要依据。

结 论

津巴布韦作为对外经济依赖程度非常高的脆弱国家，以权力合法性为角度研究其应对经济制裁压力的手段与策略，为我们分析经济制裁与政治稳定的关联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民盟政权能够在严厉的制裁环境下维持政治稳定与民族主义政治认同，以有限的社会资源换取政治忠诚并积极拓展国际经贸合作以应对经济困境的绩效合法性，以及以宪法和选举手段为支撑的程序合法性密切相关，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绩效合法性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程序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显得更为重要。程序合法性是执政党维系执政地位的前提，而意识形态合法性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制裁环境下执政党在经济绩效上的不足，因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激发了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反而成为津巴布韦克服困难、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经济制裁时长延续，民盟未来仍将在上述三个维度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与挑战，这极大地考验着民盟的执政能力。

（责任编辑：陈雅慧）

^① Lovemore Madhuku, "Law, Politics and the Land Reform Process in Zimbabwe," pp. 124 - 146.

Authors: Zhang Yanqiu,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Af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en Yuan, Lecturer of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n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Zimbabwe under Economic Sanctions

Zeng Zhu

Abstract: The “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s launched in 2000 strain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ZANU PF –led administration and Western countries, leading to economic sanctions that severely impacted Zimbabwe’s economy and citizen well – being, thereby casting doubt on ZANU PF’s governance legitimacy. Despit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induced by sanctions which forced the ZANU PF to make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in political system and share power, the rule of ZANU PF remained unshaken.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ri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itimacy of its power: ZANU PF is bolstered by its anti –imperialism and anti – colonialism liberation struggle’s ideological legitimac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via patronage networks and the “Look East” policy, as well as the procedural legitimacy through the electoral process. Collectively, these factors mitigated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ZANU PF’s regime.

Keywords: Zimbabwe, economic sanctions, legitimacy of power, regime stability

Author: Zeng Zhu,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n Analysis of Turkish Erdogan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Africa

Sun Mengqi and Li Yubo

Abstract: Since Erdogan assumed power, Turkey’s foreign policy has exhibited an unprecedentedly proactive stanc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its Africa policy. This dimens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under Erdogan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overall approach. In view of this, by combining Turkey’s domestic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urkey’s relations with Africa